

*The female narration
of Victorian novels
in England*



英国维多利亚小说 的女性叙事

姜 麟◎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前言

英国女性小说家的涌现促进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史的发展,使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众多女性小说家跻身于一向被认为是由男性主宰的英国文学领域,其中涌现出诸如勃朗特姐妹、乔治·爱略特、简·奥斯汀和盖斯凯尔夫人等享誉世界的杰出女性小说家,她们成为英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领域中的代表作家。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小说因其能相对迅速而又全面地反映一个迅猛发展的社会的全部特征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学表现形式,并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维多利亚女性小说伴随着女性运动的发展而更加繁荣。男性与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在维多利亚前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发展到了顶峰。从19世纪下半叶,即维多利亚中期开始,女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做出了巨大努力,文学适时地成为她们表达自身观点的方式。

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家虽在创作中对女性的生活和价值观做出了探索,但她们的创作中依然存在着内化社会主流观点、模仿主流文学模式、力求使自己的作品靠近男性文化标准的特点。这种特点不仅反映在她们笔下作品的内容中,同时也反映在她们在作品中选用的叙事方法中。

恋爱与婚姻是简·奥斯汀小说永恒不变的主题。简·奥斯汀从来都以女性视角进行创作,其作品中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写往往最能打动女性读者的心灵,而她将古老的婚恋题材置于一种开放状态下,强调个人教养对幸福婚姻、美好生活的重要作用更是启迪女性读者的良药。

19世纪英国女作家乔治·爱略特以其小说严肃的道德主题、哲理性的语言而跻身该国“伟大的传统”之列,与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等男性作家并驾齐驱,同时,她又力图书写女性的命运,细腻地刻画女性的心理,与简·奥斯汀等人同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作家的典范。但

是,作为处于维多利亚时期亚文化群体的女性作家,她始终带着自身不可消解的矛盾,她同情女性又不时表现出对男权的认同,她遵循女性作家的话语规则却又常常落入男性话语的圈套,这一矛盾表现在她对女性的叙事之上,存在着建构和消解女性权威的悖谬。

艾米莉·勃朗特叙事艺术表现为多元化,她以叙述者的视角、人物视角和多视角结合的方式叙事,突破了以往单一叙事视角的叙事方法,为《呼啸山庄》这部杰作拓展了思想空间,增强了艺术魅力,赋予了它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第一节 研究意义	00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003
第三节 理论与方法	006
第二章 英国维多利亚小说的时代背景	011
第一节 社会思潮	011
第二节 政治背景	016
第三节 文学源流	018
第三章 简·奥斯汀小说的女性叙事	022
第一节 叙事视角与叙事目的	022
第二节 叙事的模式与潜在目的	034
第三节 女性叙事反讽与价值观	044
第四节 叙事伦理观与叙事理想	055
第四章 乔治·爱略特小说的女性叙事	064
第一节 叙事特点与叙事选择	064
第二节 独特的情节与人物模式	065
第三节 叙事者与人物双重声音	074
第四节 聚焦女性叙事视角转变	086
第五章 艾米莉·勃朗特小说的女性叙事	091
第一节 叙事特征与诉求表现	091
第二节 叙事策划及其认知形式	095
第三节 多元叙事视角与独特性	100



第四节 叙事形态与人称的转变	102
第六章 结论	116
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生态意蕴	116
第二节 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的女性主义	122
第三节 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叙事的情感倾注	128
参考文献	135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简介

女性主义叙事学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于法国,并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发展成熟,其重要标志就是美国学者兰瑟(Lanser)的著作《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随着《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含混的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与英国女作家》《性别化的干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的叙事话语》《痛快地哭吧:女性化情感与通俗文化形式》等一系列论著的相继问世,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当代叙事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日益凸显。^①

作为女性主义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整合,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学科起点无疑是经典叙事学。它借鉴经典叙事学、女性主义研究,语言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以性别作为切入点,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将各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在叙事理论框架中加以运用,试图发现与性别相关、由性别决定或通过性别显示的各种叙事策略、叙事形式和叙事语法。

它研究性别与叙事的关系,分析特定文化和特定历史语境中基于性别的各种假设对叙事形式可能产生的影响,关注文本生成者或叙事者以及文本阐释者的性别特征和内在意识以及叙事结构,借以发现文本中所隐含的性别叙事模式和性别化的写作行为,揭示文化对男人、女人作为文本生成者或叙事者以及文本阐释者的行为规约,通过对男性化的叙事方式及叙事过程的改造和对由于性别差异而产生的各种叙事策略变化的综合评估,进而实现对女性作为文本生成者或叙事者以及文本阐释者

^①聂宝玉. 英美文学叙事理论研究[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的边缘化局面的彻底改变。

与先前仅仅关注文本生成者的性别特征对叙事的影响不同,当今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注重文本阐释者自身的性别特征及其对文本阐释的影响。作为一种研究声音形式及其社会意义相互之间关系的学说,女性主义叙事学坚持基于社会性别政治立场,在社会历史语境的前提下分析文本形式和结构,关注性别差异结构的社会历史效果,拒斥“妇女写作”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观念,对特定时间、地点内所谓的女性或男性作家的叙事形式,叙事策略与性别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简而言之,女性主义叙事学是研究女性与叙事之间关系的一个叙事学分支。其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女性问题,二是叙事问题。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文本生成者或叙事者的性别特征,注重性别角色与叙事策略之间的内在关联,发掘潜存于文本底层结构之下的女性叙事传统,并试图证明其独特性和合理性。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意义

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社会进步。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课题源于研究者的叙事实践分析,是基于社会现实的理论研究,解决女性的叙事权利和叙事策略问题以及叙事的性别取向问题,可以为妇女解放事业提供切实可行的思想指导,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为女性社会权利的获取、社会身份的确立等提供指导,为妇女解放理论提供新思想、新观念,为女性在现实社会以及作为现实社会延伸的文本和超文本这类虚拟现实中的权利和生存状态等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解决途径。

第二,重视应用研究。女性主义叙事学应用性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分别在音乐欣赏、绘画鉴赏、电视/电影等领域得到充分实现,进而涌现了音乐叙事学、绘画叙事学、电视/电影叙事学等新兴交叉学科。

第三,繁荣叙事学研究。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对叙事性文本的批评、形式分析纳入社会历史批评之中,从文本本身的形式和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框架切入叙事文本,考察不同文化时空中的文本生成者或叙事者和文本阐释者的策略和境遇以及女性图像与现代性演绎之间的关系,诠释叙事生成和阐释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变异现象,尤其是通过考察各种性

别叙事变体形式与社会文化影响之间的关系,揭示性别叙事行为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模式,从具体的艺术实践与文学现象中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诗学思想,进而揭示叙事生成与阐释过程中与性别相关的权利意识、价值观、审美标准等,阐释女性形象所包含的文化建构与性别认同的多重含义以及性别视角对于形象塑造的意义,展示了脱离语境的叙事诗学如何可以成为政治文化批评的有力工具,为叙事学的复兴和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历程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作为对盛极一时的经典叙事学理论的反动而出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经典叙事学理论的批评者,更是其拯救者。经典叙事学产生于结构主义盛行的20世纪60—70年代,逐渐成为国际研究主流。之后,随着各派政治文化批评和后结构主义的日渐强盛,以及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的夹攻、贬斥和排挤,经典叙事学研究江河日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挽救经典叙事学成为叙事学界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一个理想的选择就是在不彻底抛弃经典叙事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引入女性主义这样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使其与政治批评相结合,既可拯救经典叙事学,又可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叙事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应运而生。它将结构主义的形式研究与女性主义文评的功能研究融为一体,为当时处于学术困境之中的经典叙事学提供了一个得以继续存活的途径。由于法国女性主义文评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且注重哲学思考,与注重文本结构的叙事学基本框架存在根本差异,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未能在法国蓬勃发展,更没有产生如在美国那样的显著影响。

美国学者兰瑟作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鼻祖,不仅深受形式主义、女性主义文评的影响,而且受到吕西安·戈德曼、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和特里·



依格尔顿等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以及将文学视为交流行为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启发。正是形式主义和女性主义文论之间的冲突、碰撞和融合使兰瑟萌生摆脱经典叙事学研究桎梏的学术诉求,试图从文本形式与社会历史语境的结合处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她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就是叙事形式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完美结合的典范。之后,将叙事学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者相继出现,其中包括布鲁尔、沃霍尔、巴尔等。这些研究者质疑结构主义叙事学忽略社会历史语境的做法,主张将叙事性研究与性别政治相结合,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探讨叙事策略和叙事结构。随着这一新型研究范式的进一步深入,“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终于在1986年出现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兰瑟与以色列学者狄恩戈特随后在《文体》杂志上展开的论战则大大促进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向纵深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性别化的干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和《含混的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与英国女作家》等论著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目标、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做了进一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评实践。之后,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成果纷纷在《叙事》《文体》《现代语言协会会刊》等杂志上发表,标志着女性主义叙事学已成为叙事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二、女性叙事学研究现状

近年来,女性主义叙事学呈现出多元交叉的发展态势且与酷儿叙事日渐结合紧密,其集中体现便是沃霍尔和兰瑟主编的文集《解放了的叙事理论:酷儿介入和女性主义介入》(Narrative Theory Unbound: Queer and Feminist Interventions)。这是自1996年以来第一本女性主义叙事学和酷儿叙事学合集,理论探索聚焦于文化语境中的性别、情欲和叙事的交叉性,叙事文本的创造、接受、形式和功能,叙事话语和叙事话语成分以及糅合种族、宗教和国别文化的交叉性叙事批评阐释。玛格丽特·霍曼斯教授高度称赞该书,认为其“是一部重要的、改变学科领域的论著。它是所有叙事理论课程的必读之作,也可被广泛地应用于文学理论课程、女性主义/酷儿理论与批评课程”。^①在该书的《导论》中,兰瑟详细阐述

^①Warhol, R. & S. Lanser. Narrative Theory Unbound: Queer and Feminist Interventions[M].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

了女性主义叙事学和酷儿叙事学的历史、特征、意义和交叉属性,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叙事理论彼此之间相互依赖、不可分离,颇有对话的必要。

卡林·库库宁(Karin Kukkonen)认为认知的转向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带来了崭新的方向,而当代认知叙事学因为研究范围转向大脑、身体和语境的关系,亦开始接纳女性主义的研究视野。在《移动的目标——认知叙事学与女性主义》(A Moving Target—Cognitive Narratology and Feminism)一文中,库库宁以英国历史小说家希拉里·曼特尔的短篇小说《刺杀玛格丽特·撒切尔》(The Assassination of Margaret Thatcher)为例,勾勒出叙事、身体形象/身体图式和隐喻之间的互动,并采用倚重身体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来研究这些复杂的互动。玛丽亚·坦布库(Maria Tamboukou)在《重新思考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主体:叙述人格和“真实”故事》(Rethinking the Subject in Feminist Research: Narrative Personae and Stories of “the real”)认为,作为叙述人格的德塞丽无法等同于真实的德塞丽,因为叙述人格无法被确定下来。因此叙述人格是“既体现又深藏的历史主体,对她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形式加以实际的干预”。^①坦布库又从阿伦特的“人格”概念中吸收人格的表演性特征,认为叙述人格游离在变化的主体位置之间。汤丽·杨(Tory Young)在《数字时代的不可见性与权力:涉及女权主义与酷儿叙事的问题》(Invisibility and Power in the Digital Age: Issues for Feminist and Queer Narratology)一文中,考察了可见性与权力在数字时代的关系。杨以照片墙(Instagram)时代的口号“没有图片就是不曾发生”和英国女作家阿丽·史密斯(Ali Smith)的小说《如何二者兼而有之?》(How to Be Both)为例,印证再现的可见性能够产生权力。杨认为史密斯的小说以可能的形式使不可见的重获权力,因为正如佩吉·费伦所言:“你无法总是看见你可以成为的样子。”^②

^① Tamboukou, M. Rethinking the subject in feminist research: Narrative personae and stories of “the real” [J]. Textual Practice, 2018, 32(06): 939-955.

^② Young, T. Invisibility and power in the digital age: Issues for feminist and queer narratology [J]. Textual Practice, 2018, 32(06): 991-1006.



第三节 理论与方法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围

作为一门应用型边缘学科,无论是理论的借鉴还是方法的应用,女性主义叙事学同社会学、哲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存在紧密联系,体现出研究范围开放、宽泛、多元、多样和驳杂等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和多层面互动的格局。^①

从对研究对象的观察模式来看,女性主义叙事学可以分为宏观女性主义叙事学和微观女性主义叙事学两个层面。宏观女性主义叙事学,指的是以女性本身(包括女性叙事者、阐释者和文本生成者)作为研究起点,同时将叙事学作为研究不同女性主体或客体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微观女性主义叙事学,指的是以叙事研究为起点,同时将各种社会文化历史因素作为影响叙事生成和阐释的基本因素。显然,宏观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把女性本身作为关注的焦点,把叙事现象(包括叙事过程、文本解读、叙事方式、叙事主体和客体)视为边缘产物;微观女性主义叙事学则是从叙事学的视野出发,把叙事现象作为关注的中心,把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衍生物。可见,这两种学术研究取向各有侧重,也各有利弊。

就研究方向而言,女性主义叙事学可分为理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和应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两大部分。理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的问题是,在考察叙事文本和叙事主体结构相关性时应当采取什么模式与方法,并为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与叙事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的讨论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解释;应用女性主义叙事学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考察隐藏在叙事话语权不平等现象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含义方面,尤其是在小说、散文文本这样一些涉及叙事话语权问题的公共生活领域。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分野,乃是基于女性在叙事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主体或客体、叙

^①胡媛. 从女性主义叙事视角解析《南方与北方》[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0, 36(04): 33-34.

事者或被叙事者、阐释者或被阐释者)、话语权与阐释权、文本结构形式对文本阐释者性别身份的建构和强化以及由于权势、阶层等因素诱发的叙事结构差异和语言不平等现象的研究。一般而言,理论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有助于说明叙事中性别身份的流动性,帮助女性忘记其他主体的注视,仅仅关注阅读对自己身体的影响,为女性主义文评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为后经典叙事学理论提供理论支撑。

应用女性主义叙事学有助于发现并解决女性在现实环境和非现实环境中所面临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权利问题,为女性作为一个社会行为主体的发展提供具有可行性的指导。

根据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具体研究内容,我们可以罗列出一系列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热点问题。这表明: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内容极为驳杂,研究范围非常广泛。

沃霍尔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有三大任务:①寻找女性写作的叙事实例,并在历史语境框架内解释由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结构差异;②用叙事学的分析范畴对文本展开条分缕析式的分析,并对叙事做出与性别相关的阐释;③研究文本结构与性别意识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研究女性的叙事权利和叙事策略以及与叙事相关的女性问题的学科,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学科内涵决定了女性叙事必然成为其主要研究领域。就女性主义叙事学整体而言,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基本的研究内容。除此之外,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其他研究领域还包括“叙事层次与性别身份”“性别意识与性别政治”“性别话语与叙事者身份”“女性与文本生成和文本阐释”“性别视角与形象塑造”“叙事形式与性别行为”“性别与阅读历史”“文本生成者和阐释者的性别取向与种族意识”等。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试图将研究范围扩大到认知叙事学、修辞叙事学等其他后经典叙事学领域,以及整个文学理论领域。这表明,其学术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学术声望正在日益提高。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理论建构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理论建构不仅影响其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学科声望的提高,而且影响其学术影响的扩大和学科发展的速度。我们主要讨论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建构的以下三个方面:①何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理



论? ②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发展是否充分? ③如何理解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理论发展从一开始就与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女性主义还是叙事学都可以在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找到其根源,如 Saussure 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观、涂尔干的外部整体论哲学、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思维分析。

女性主义叙事学以性别作为切入点,通过融合经典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并结合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解构主义的方法,分析女性性别角色在文本生成和阐释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对叙事策略和叙事权威的构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将性别经验、叙事体验和文本立场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叙事综合体,借以建构一个超越经典叙事学的知识体系。多年来,新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这不仅使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的研究视野得到极大的拓宽,而且使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因而,女性主义叙事学在学科内容方面体现出多样性,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方面体现出多元性,在研究方法方面体现出随机性,在研究群体方面体现出广泛性。这些特点既是优势,也是劣势。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女性主义叙事学才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不仅挽救了经典叙事学,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叙事学的蓬勃发展;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女性主义叙事学迄今尚未建立普遍的理论范式,缺乏成熟学科所普遍具有的学科特征,导致理论建设尚欠充分,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女性主义叙事学缺少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模式来对其研究中的各种发现加以概括并予以解释,缺乏公理系统的一般特性,即描写的充分性、解释的完备性、理论的明晰性、原则的自明性和结论的普适性;②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建构尚不充分,学科类属的交叉性和学科内部的多样性尚未厘清,研究注重局部层面而忽视整体层面,研究成果多为有感而发,缺少学理层面的技术支撑,缺乏具有前瞻性、普遍性的理论指导模式;③女性主义叙事学尚未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协调的知识体系和一套成熟的研究方法,行动路线缺乏明确性,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抑或是中观层面,尚未就女性与叙事、女性与社会、女性与权利等关键课题及其关系建立一个自成体系、完全自治的整体和

学科范式；④女性主义叙事学缺乏整合性，创新和兼容性未能得到有机结合，对叙事过程中的性别、文化、历史差异和社会因素与叙事生成和阐释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有效的整理，对不同理论观点的内涵疏于整理，对已有的知识体系及其知识建构逻辑未能加以重新审视，在对以男权为中心的主流知识体系进行解构的同时却未能在跨学科研究层面上形成有益的互补机制，更谈不上建立如同黑格尔哲学那样“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要继续发展，就应当在理论建构方面有所改进。具体而言，首先，女性主义叙事学应当在学科内部创建科学合理的学科评判标准和统一的学科理论范式；其次，女性主义叙事学应当将解释的充分性和理论的完备性作为理论建设的终极目标；再次，女性主义叙事学应当坚持文本形式分析与社会政治批评研究并重的研究方针，将文本分析纳入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最后，女性主义叙事学应当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出发点，并将女性和男性在叙事过程中的身份、地位、作用和特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整合论路径，既要基于叙事文本和叙事过程本身，又要超越叙事文本和叙事过程本身。

三、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方法

由于女性主义叙事学学科本身的跨学科属性和研究者学术背景的驳杂性等原因，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往往富于变化，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研究方法上一直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的是性别尤其是女性与叙事之间的关系，考察叙事过程中女性角色的叙事主体身份、主体意识、审美视角、权利意识与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机制，并描述和解释引发各种变化的内部机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叙事学旨在探究女性叙事的行为表现，揭示性别、社会、文化等相关因素的互动关系，建立一种能够充分解释女性叙事发展变化与女性生存现实图景的理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增强学科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提高其理论阐释力和预测力、加强理论完备性建设成为女性主义叙事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会



遇到多种因素同时相互干扰而难以厘清关系、研究对象难以控制等难题,因此,如何确定并评价叙事者的性别、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对叙事形式和叙事策略的影响,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再者,早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大多为就事论事式的个案研究,缺乏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探讨,感性特征突出而理性分析欠缺,这样的研究既缺乏科学依据,又缺乏可证伪性,更缺乏普遍的理论意义,因此,如何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有机结合,为女性主义叙事学提供形式化的描写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学科开放性、边界不定性、内涵外延性、理论驳杂性、方法多样性、内容多元性、视角宽泛性理念的逐步认同,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显著变化:注重文本叙事形式与社会功能之间多层界面的互动机制研究;注重性别角色在叙事结构、叙事逻辑、叙事语法和叙事层级方面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分析女性叙事者的语言行为与叙事特征,探究叙事形式与言语行为的规律与模式。然而,就整体而言,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方法论构建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仍存在缺陷,与其他成熟学科相比,依旧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第二章 英国维多利亚小说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社会思潮

一、维多利亚时代阐述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文化以及政治发展的一个巅峰时代。资本主义的物质积累相对完成,因手工业上的发展而有效地促进了英国工业革命,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巅峰的状态。在近代的英国时期,维多利亚时期的执政女王对其礼仪以及文化发展有严重的影响,促进了这种文化的发展,当时的社会状态被后人称为是文雅的社会,这一时期的英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于礼仪之邦的称号。在这一时期的英国,绅士文化以及文化心理的转变得到了相对较大的发展。繁荣并且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打上了深深的具有时代独特性的烙印。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产物,这种文化思想也有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各个阶层之间详细的生活状态,造就了独特的文学思想的转变。

二、社会思潮——绅士文化

英国的“绅士”这一词语最早是在1413年出现,亨利五世在当时首次提出这一说法,在上诉以及被控告的过程中,需要对于被告的财产以及社会地位做出详细的阐述,就需要对于这一词语进行使用,因其代表了主要是在骑士以及男爵的家庭中非常年轻但是没有任何头衔的贵族的称谓。在亨利八世,教会以及宗教信仰活动使用的土地被国王所收,成了其私有财产。

新兴起的阶层以及在当时地位相对较为低下的绅士就会通过购买这些土地而获得来自人民的尊重。中产阶级的商人也很快意识到这一商业契机,通过购买土地这一方式获得人们的尊重,可以成为绅士。在新

的时期,绅士这一词语开始包含了一些新的含义,主要是对于土地以及个人财富和追求。17世纪,在英国发生了相对严重的内战,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绅士这一角色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在18世纪的英国,绅士的含义有了新的变化,对于一些学者以及商人都可以称得上是绅士,绅士的称号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环境以及个人的财产和社会地位,而是对于个人的行为以及对于社会的影响来决定的。19世纪的英国,关于绅士的演变不再是以上的含义,而是对国家以及社会非常有用的职业以及个人,这个世纪之后的人们不再根据个人身上所佩戴的勋章以及是否拥有很多的金钱和很高的社会地位来评判一个人是否是绅士,主要是将其行为衡量是否是绅士的条件,这与现代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在维多利亚时期,绅士文化的发展可以间接地对一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转变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社会思潮——女性文学

在英国文学史上,维多利亚时期是女性文学崛起的时代。在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女性作家和一些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比如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以及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南方与北方》等。她们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具有独特魅力的女性形象,为女性作家在文学环境中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还使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光彩夺目地走在了世界文学的前面。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过程也同样是复杂而漫长的,女性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宣扬了女性对自由、平等的追求。随着女性光辉不断显现,女性意识得以彰显和升华。尽管如此,在男权传统的长期压抑和影响下我们也读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局限性和妥协性。^①

(一)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文学兴起

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由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①鲍丹. 试析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特征[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4, 30(11): 17-18.